

系统、时间与社会进化

——评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

唐 健◎

【内容提要】 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一书，气势宏大，具有为国际政治学科（乃至整个社会科学）奠立新的系统范式的雄心。通过借鉴生物学中的进化论，唐世平搭建了社会进化理论，在协调处理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的基础上，将“突变—选择—遗传”机制引入国际政治研究，用以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变迁。《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一书具有很多原创性思想。在本体论上，唐世平倡导系统研究，并为如何开展研究进行了有效尝试，很多努力具有突破意义；在认识论上，唐世平的机制研究为超越简单的因果关系研究提供了启示，能够更好地研究不断变化的国际政治。然而，本书也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如：将战争作为国际系统转型的根本标准是否合适；社会进化在空间上的丰富性被抹杀；对社会进化论演化随机性的处理存在问题。

【关键词】 唐世平 系统 时间 社会进化

【作者简介】 唐 健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2013 级博士研究生。

电子邮箱：ndtj2008@126.com

* 感谢《国际政治科学》杂志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建议，同时感谢杨原博士在论文写作过程中给予的帮助和意见。文中错漏由笔者负责。

启蒙时代的“古今之争”导致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目的论思想日渐式微，为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进化论的出现准备了宏观背景。^①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出版，其进化论在之后150多年的时间里由饱受争议到被广泛接受，不仅在生物学领域确立了正统地位，^② 也在人文社会科学中产生了广泛影响。但是由于学者的误解和错误运用，特别是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等人创建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对进化论的错误发挥，使得进化论声名扫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思想环境中对进化论的敌视才逐渐散去。^③ 在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文化学以及政治学等领域，越来越多的学者发现进化论具有整合各自学科、建立宏大叙述范式的能力。

虽然之前已经有学者呼吁将达尔文主义引入国际关系研究并取得了一些成果，^④ 但是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⑤ 却是国际关系学者第一次对进化论进行系统阐释。该书是一部雄心勃勃之作，不仅试图一举解决国际政治领域内主要理论

① “古今之争”的内容和影响可以参考迈尔《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林国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刘小枫选编《施特劳斯与古今之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刘小枫、陈少明主编《维科与古今之争》，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与文艺复兴之间关系的简要介绍参见 Michael Ruse, *The Philosophy of Human Evolu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 1–4。

② 由于主题和篇幅的限制，本文对生物学领域中的进化论发展历程不做介绍。2009年为了纪念《物种起源》发表150周年，诸多学者合作编辑出版了一本文集，对进化论的发展历程、最新进展及现有争论做了全面介绍。参见 Michael A. Bell et al., eds., *Evolution Since Darwin: The First 150 Years* (Massachusetts: Sinauer Associates, Inc. Publishers, 2010)。

③ 进化论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发展历程可参见 Geoffrey M. Hodgson and Thorbjorn Knudsen,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pp. 1–18。

④ Bradley Thayer, “Bringing in Darwin: Evolutionary Theory,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25, No. 2, 2000, pp. 124–151。

⑤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笔者认为将“evolution”译作“演化”更合适，因为在中文里“进化”多少都含有更高级、更进步的意思，下文将指出这与真正的“biological evolution”或“social evolution”是相违背的。唐世平在自己的博客中也将其书名翻译成《国际政治的社会演化》，一是出于习惯译法，二是在他的一些已被译成中文的正式发表的论文中用的都是“进化”的译法，所以本文依然将“evolution”译作“进化”。

(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的争执,更尝试建立新的、综合多种范式的整合范式:社会进化范式,以此筹划国际关系研究的新议程。本文赞同巴里·布赞(Barry Buzan)在一篇简短书评中做出的评价,认为唐世平这本书“包含了重要的富有原创性和洞见的思考,能够激发对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中主要立场和论证的重新思考,但是该书也存在一些大的错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至少是部分削弱了作者的雄心”。^①

唐世平这本书非常依赖他以前的研究成果,但是在该书中这些成果要么被略去不表,要么被极为简单地处理,这不利于读者理解全书内容。因此本文会将他以前的成果与这本书结合起来探讨他理论建构的完整思路,这将使我们深入到唐世平持有的本体论和认识论,理解其理论建构的深层逻辑。^②

全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对唐世平的社会进化论进行分析介绍。第二至第四部分探讨这本书存在的重大问题。其中第二部分讨论的是以“战争”作为划分国际体系标准的可行性,以及唐世平对“权力”的分析中存在的问题。第三部分讨论进化多样性问题。第四部分反对唐世平不可逆转的时间观,并针对演化随机性提出自己的历史观。第五部分从探讨社会进化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入手,展现唐世平此书对国际政治研究的贡献与启示,同时指出社会进化论可以深入研究的方向。最后一部分对全文进行总结。

① Barry Buzan, “Book Review,”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5, 2013, p. 1304.

② 这些成果包括:王铸成、唐世平:《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巴斯卡的“先验(科学)实在主义”》(未刊稿);徐立峰、唐世平:《科学实在主义与人类解放:巴斯卡的“批判实在主义”》(未刊稿);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第1期,第84—107页;《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0—150页;《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5—31页;《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41页;唐世平、龙世瑞:《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9期,第84—111页;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与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194—205页。上述文章均可在唐世平的个人主页上找到,参见网址 <http://www.sirpa.fudan.edu.cn/s/56/t/134/16/fa/info5882.htm>。

一 问题的提出与理论构建

时间是任何理论都必须考虑的维度，也就是说任何理论对如何处理时间问题都必须给出或明显或潜在的回答。在国际关系理论中，从时间维度来看存在两种基本分野：循环与进化。^① 受结构现实主义的影响，循环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占据主导地位，而且表现形式单一，即简单的“没有重大变化”。^② 当然也存在带有进化色彩的理论，如新自由主义^③和建构主义^④等等。但是，唐世平指出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虽然多少具有一些进化观的特征，但是都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问题。^⑤

那么应该如何正确看待循环与进化之间的分野？如果国际政治是进化的，那么应该如何缔造真正的进化理论？要回答上述问题，首先要在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人与世界的关系这一根本问题做出回答。围绕这一根本问题，社会科学领域形成了不同的基础范式，“这些基础范式如同

① 秦亚青：《循环与进化：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思维取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

②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信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约翰·米尔斯海默：《大国政治的悲剧》，唐小松、王义桅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③ 新自由主义将自己的适用范围大致限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认为国际制度的发展已经使得国际关系出现了根本性变革。

④ 以亚历山大·温特（Alexander Wendt）为例，他明确指出了国际关系存在三个不同文化主导的阶段：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温特认为随着人们观念的变迁，国际关系现已进入了洛克文化阶段，并最终进入康德文化阶段，甚至会出现一个世界政府。参见亚历山大·温特《世界国家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目的论与无政府逻辑》，《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1期，第57—62页。

⑤ 新自由主义过度依赖功能主义路径来阐释制度的变迁，这使得他们的理论不可避免地沾染了功能主义自身存在的问题，即以和谐路径来研究制度变迁。正如下文将要指出的，唐世平认为与和谐范式相比，冲突范式在本体论上更具优先性。和谐路径无法解决制度变迁的知识不完备、行为体过剩和制度的分配效果等三大难题。唐世平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参见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6。建构主义者反映了更多的进化观念，在他们笔下国家的偏好不再是固定不变的，温特赋予无政府状态以可变性并指出推动转型的若干可能力量。但是温特和绝大部分建构主义者都过分依赖于观念因素，而忽略或者贬低了物质因素的根本意义。这使得温特等人无法解释那些制造无政府状态的观念为什么能够产生，如何产生以及是怎么扩大影响范围的。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9。唐世平还对国际政治理论中其他一些富有进化精神的理论进行了介绍和分析，但认为它们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参见该书第35—40页。

手电筒般照亮了人类社会的不同方面或区域”。^①

唐世平是在“科学实在主义”(Scientific Realism)的基础上看待社会科学的。“科学实在论”决定了其理论构建的几个前提:第一,社会科学中的本体论探讨对于摆脱“认识论谬误”(Epistemic Fallacy)至关重要。科学实在论主张分层本体论,而“机制”是本体论最深的层次,世界是由机制构成的。^②因此,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样,都应该探究“生成性因果机制”(Generative Causal Mechanism)。^③第二,科学实在论认为存在真实客观的物质和观念世界,它们独立于个体的观察和思考之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虽然存在巨大差异,但目标都在于理解和解释世界,尽管可能会出现偏差和谬误,但实现真实的知识是可能的。^④第三,人类解放。社会科学还担负有实现“人类解放”的任务。通过运用发现的社会机制,人们可以在实践中得到更大的解放。^⑤

在科学实在论基础上,唐世平归纳了社会科学中的 11 个基础范式,包括九个基石性范式和两个整合性范式。九个基石性范式共分为四组,分别是物质主义和观念主义、个体主义和集体主义、生物进化和社会化,以及反社会化、冲突范式与和谐范式。这九种基石性范式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存在严重冲突,但都只反映了部分事实,因此,每一组基石性范式之间

①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第1期,第84页。

② 科学实在论之前的科学哲学总是回避本体论问题,认为本体论是无法在主体间进行探讨的形而上学问题,所以都选择将本体论问题放在认识论和方法论层面来讨论,巴斯卡将这一做法称为“认识论谬误”,它使得人成为因果关系的前提,造成“人类中心主义”。因此,“认识论谬误”切断了科学活动与真实世界之间的联系,所以科学活动终将陷入无限的还原之中。参见王铸成、唐世平《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巴斯卡的“先验(科学)实在主义”》(未刊稿),第3—6页。

③ 徐立峰、唐世平:《科学实在主义与人类解放:巴斯卡的“批判实在主义”》(未刊稿),第3页。

④ 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年第1期,第85页。参见王铸成、唐世平《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巴斯卡的“先验(科学)实在主义”》(未刊稿);徐立峰、唐世平《科学实在主义与人类解放:巴斯卡第“批判实在主义”》(未刊稿)。国内对科学实在主义的研究有任晓明、赵华的《批判实在论的因果机制思想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9期,第39—43页;殷杰、安旻:《巴斯卡的批判实在论思想:兼议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第三条进路》,《哲学研究》2007年第9期,第96—102页;赵华:《巴斯卡批判实在论研究》,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5月。

⑤ 徐立峰、唐世平:《科学实在主义与人类解放:巴斯卡的“批判实在主义”》(未刊稿),第7—11页。

首先要实现融合。从表 1 可见，物质主义、个体主义、生物进化决定论和冲突范式，是在本体论上具有优先性的范式，因此在各自的综合过程中一定要使它们占据更大比重。例如，在建构主义中，观念因素在本体论中占据了绝对优势，所以他们误解了国际系统的本质，解释力有限。

表 1 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

	第一维度： 观念和物质	第二维度： 个体和群体	第三维度：行为的 驱动力，三个层次	第四维度： 和谐和冲突
本体论优先性较少的范式	观念主义	集体主义	反社会化	和谐范式
			社会化	
具有本体论优先性的范式	物质主义	个体主义	生物进化决定论	冲突范式

资料来源：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 年第 1 期，第 99 页。

唐世平归纳的这四组九个基石性范式代表了社会科学研究四个维度，即物质与观念、个体和群体、行为的驱动力以及和谐与冲突，因此要想充分理解人类社会，就必须将这九个基石性范式进行有机综合。在最充分的情况下，社会系统范式可以实现这一任务。在本体论上，社会系统范式认为人类社会是由行动者、社会结构和物理环境构成的复杂系统。从认识论上讲，要认识这一复杂系统只能依靠系统方法。

但是，唐世平恰当地指出社会系统范式忽略了时间维度，因而无法解释社会系统发生的变革与转换。要实现这一点，只能依靠社会进化范式。唐世平表示，“社会进化范式给予了社会系统范式以时间维度并赋予时间以转换社会系统的力量”。^① 顺理成章，他的任务就是搭建其所称的“真正的社会进化理论”并用以解释国际政治。他认为人类社会与生物系统存在着巨大差异，因此生物进化论必须经过重大修正才能适用于解释人类社会，否则不是全盘错谬的话也必是漏洞百出。在生物系统中，完全是物质力量（Material Force）在起作用，而人类社会与之最大的不同在于精神

^① Shi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30. 类似的表述亦可参见唐世平《社会科学的基础范式》，《国际社会科学》（中文版）2001 年第 1 期，第 96 页。

力量 (Ideational Force) 的介入。虽然精神力量自身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但是它一旦产生就会深刻地改变人类社会系统。因此,社会进化论必须依靠协调处理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两个维度才能阐释人类社会。

从上面的观点可以看出,进化论的“变异—选择—遗传”这一核心机制必须经过调整才能运用到社会科学上。在生物进化中,变异依靠三个完全随机的机制:DNA 破坏、基因材料的交换或重组以及外部入侵。相对应,精神维度的变异 (新观念) 来源为:新观念的自生、观念互补 (Cross-Breeding of Ideas) 以及外来观念的入侵。社会进化中精神力量的变异不是随机和盲目的,因为人为地解决问题或达到目标与预期可以创造、引入某种观念,而且现存的社会结构有力地决定了何种观念会产生、被选择和遗传。

在社会进化中,选择的压力来自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物质,即某种观念是否能提高人的福利水平,依然是最终的决定因素。但精神力量在选择将何种观念付诸实践时是更加直接的选择力量,人工选择而非自然选择主导了社会进化的精神维度。

在遗传机制上,生物进化中的“魏斯曼障碍”^① (无法实现从表现型到基因型的遗传) 在精神维度是不存在的,因为个体可以通过学习和接受教育获得先人的经验与知识。因此,观念基因 (如观点) 和表现型 (如制度和文化等) 作为习得特性,都可以直接传递至下一代。唐世平将这种遗传方式称为“超级拉马克遗传” (Super-Lamarckian)。但是每一代人不会毫无保留地接受先人传递下来的基因和表现型,他们会进行选择,因此可以说社会进化的精神维度的遗传机制是“内嵌于超级拉马克主义

^① 格里格·孟德尔 (Gregor Mendel)、托马斯·摩尔根 (Thomas Morgan)、汤姆逊 (William Thomson)、沃森 (James Dewey Watson) 和克里克 (Francis Harry Compton Crick) 等人的研究证实了生物进化论的基因基础,证实了新达尔文主义,而否定了拉马克主义。魏斯曼 (August Weisman) 指出了细胞核 (nuclei) 和细胞质 (cytoplasm of a cell) 之间存在障碍,这就废除了习得特性直接遗传的可能性。“魏斯曼障碍”表明基因型可以引起表现型,但表现型无法直接引起基因型。在分子层面,“魏斯曼障碍”表明生物进化中的信息流动是单向的:从基因物质 (DNA 或 RNA) 到蛋白质,但不能反向为之。参见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3 – 15.

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an Nested within Super-Lamarckian)。^①

唐世平运用修正后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转型。他认为人类社会经历了伊甸园似的天堂、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更加规范化的世界四个阶段。这些转型的原因、进程和影响等问题,只有依靠社会进化范式才能得到很好解决。

在伊甸园式的天堂里,由于资源丰富、人口稀少、空间宽阔,人类是没有战争的。但是随着人口稳步增长,资源和生存空间变得相对短缺,与此同时群体认同以及杀戮的技巧和工具逐步发展起来。人口增长、资源下降和农耕部落的增加这三个因素相互作用,最终摧垮了伊甸园。变异的国家即进攻性国家开始出现,对战争(战败)的恐惧传播至整个(次)体系,该体系逐渐转变成为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为了满足战争的需要,群体的结构将发生变化,战争制造了国家、社会和我们自己,而国家、社会和我们自己又会制造更多的战争。在这样一个世界里,非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将被淘汰。

但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必然会进化为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②进攻性现实主义的“征服或者被征服”逻辑是造成这一转变的根本机制。国

①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20–29.

② 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是现实主义理论内部的分野。进攻性现实主义认为国家始终处于危险的无政府状态,在此状态下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将通过有意识地降低他国的安全来保证自己的安全。防御性现实主义也认为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但冲突并非不可避免,因此奉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国家不会有意图地降低他国的安全。由于假定的不同,两种理论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得出了不同的判断,这种分歧无法通过逻辑推演得到解决。两种理论的支持者都试图通过实证的较量证明自己。唐世平认为他们的错误正在于以为国际政治理论只能接受相同历史经验的考验才能证明孰优孰劣,指出要解决进攻性现实主义与防御性现实主义的争端,恰恰要诉诸不同的历史时期。进攻性现实主义适用于伊甸园之后的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但这是一个自我毁灭的世界,它不可避免地进入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11页;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97–98。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区分是依据“他们处理其他国家意图的不确定性及来自于该不确定性的恐惧的不同方式”,他认为区分这两种类型国家的标准是它们对战略的不同偏好,而不是对结果或者目的的不同偏好。参见唐世平《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从米尔斯海默到杰维斯》,《当代亚太》2009年第4期,第11页,注释2。唐世平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更详细的研究参见 Shipping Tang, *A Theory of Security Strategies for Our Time: Defensive Realism*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家间的相互征伐造成了两个结果：国家数量的大幅度下降和国家平均大小（土地、人口和资源）的增加。国家在领土、人口和资源方面的扩张意味着防御将变得相对容易，而征服则越来越困难。

除了上述核心机制，另外三个辅助机制也促进了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到来：第一，随着“进攻—防御”优势互换，系统中的“选择”将对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越来越不利；第二，“征服正变得困难”这一观念的传播，使国家逐渐认识到防御性战略是更优的治国方略；第三，主权观念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与传播，使得领土的占领成本更加高昂。二战之后，由于暴力征服导致的国家灭亡基本停止，这一具有决定意义的证据表明，国际政治已经不可逆转地从“米尔斯海默世界”转变成为“杰维斯世界”。

步入“杰维斯世界”之后，我们将向更加规则化和制度化的世界演进。唐世平认为，既有的“和谐学派”和“冲突学派”都无法为制度的产生、变迁和发展提供充分解释，我们需要新的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他认为制度变迁理论包含以下几个要点：首先，制度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背后有权力支撑，所以争夺制定规则（制度）的权力斗争是首要关注点，这也意味着制度并不是总能提高公共福利。其次，制度变迁的过程包含六个阶段：产生出关于特定制度安排的观念、政治动员、围绕规则制定权展开争夺、创建规则、规则合法化、稳定与复制。这六个阶段与社会进化的“变异—选择—遗传”核心机制相吻合。再次，制度起重要作用的方式是它能够塑造单元（agents）的行为。^①

在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与社会进化论范式之下，要理解国际系统中的制度需要注意以下几点：首先，与国内制度一样，国际制度变迁的核心也是围绕制度的制定权而展开的斗争；其次，由于权力是制定和维持制度的关键，所以赢得制度制定权的行为体或行为体联盟对制度的本质有更大的

^①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12; 唐世平：《制度变迁的广义理论》，第 7—11 页。

（有时候是决定性的）影响；再次，从社会进化论视角来看，更加规则化的世界只能发生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确立之后；最后，制度一旦确立将会反过来巩固和平，推动国际体系转变成为更加规则化的系统。^①

由于权力在制度建立和维持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唐世平认为必须对制度进行批判研究，防止将制度、系统、秩序或结构理想化，这样才能认识到更好的（虽然绝非完美的）规则化世界。因此，与一些学者（如温特）预言世界政府将在未来出现不同，唐世平认为世界政府非但不会实现，即使实现也是有害无益。因为制度必然伴随着权力支撑，因此它并不能完全确保自身的正义性，所以它的推广必然伴随着暴力与恐怖。对于制度，我们需要采取批判态度，在批判中不断建立更好的制度，但是在一个世界性的政府内，批判是不存在的。

任何理论建构都会存在疏谬和不足。笔者对唐世平这本书不会吹毛求疵，仅就其“可能”存在的重大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和意见。该书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存在问题：将“战争”作为国际系统转型的根本标准是否合适，对“权力”的处理也存在问题；社会进化在空间上的丰富性被抹杀；对社会进化论演化随机性的处理存在问题。

二 战争、权力与相对主义

唐世平将战争的有无与多寡作为定义国际体系的根本指标，这带来了三个问题。首先，他认为在“伊甸园时期”，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力低下等原因而相互隔绝，所以人类未能爆发战争。但是，成员间存在起码的互动是“国际体系”这一核心概念存在的前提，因此他笔下的“伊甸园时期”根本不存在国际体系，没有体系就无所谓体系成员，因此这一时期的关系几乎都是群落或部族的内部关系。但是唐世平定义的“战争”只能是体系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他已经将内部关系排除了“战争”

^①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12 – 114.

的定义。^① 因此可以说, 其“伊甸园时期”是逻辑先于事实存在的, 也就是说, 即使不依靠事实根据, 他的界定也能成立。如果我们能够发现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期, 人类群体之间的交往已经十分密切, 但却没有战争或战争非常稀少, 这时候再给出社会进化论的解释才是真正有意义的。

其次, 要想将战争作为判定国际体系性质的标准, 就必须论证战争自其诞生之日起 (直至其消亡) 就在人类社会中扮演了最重要的角色。唐世平也意识到了这一前提, 所以他用了大量篇幅来论证“战争制造国家, 国家制造战争”及战争文化,^② 以表现战争决定性地影响了人类社会的其他领域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的组织形态和实质内容。

毋庸置疑, 战争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并对其他领域 (政治、经济和文化等) 产生决定性影响在人类社会有些时间段肯定存在, 但是问题在于这些时间段持续了多久? 人类历史中是否存在一个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两个世界的划分?

从历史事实来看, 战争文化弥漫于军事领域是经常发生的, 但是如果它延伸至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其他领域, 对一个共同体而言是不健康的, 也是难以持久的。正因为这样, 历代学者对这类国家多持批判态度, 认为这种穷兵黩武的倾向会败坏共同体或国家的活力与道德, 最终会导致国家的灭亡。按照唐世平的表述, 在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中, 非进攻性国家在竞争中会被剔除干净, 剩下的都是进攻性国家。^③ 这一说法并不准确, 借用另一个概念的表述更合适: “自强制性改革”成功的国家会赢得胜利,^④ “自强制性改革”会发生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领域。

如果认识到评估人类社会演进要全面考虑到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

①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3–44.

②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81–87.

③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3. 历史经验往往与唐世平的论断恰恰相反, 进攻性国家多是“其兴也勃焉, 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

④ 对“自强制性改革”的说明参见许田波《大一统对抗制衡》, 《国际政治科学》2005 年第 1 期, 第 78—105 页; 许田波《战争与国家形成: 春秋战国与近代早期欧洲之比较》, 徐进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 第 8—30 页。

等各个领域,^① 就会发现唐世平的研究至少存在以下两个问题:其一,以进攻性和防御性作为划分国家类型标准的合理性。他以战略偏好将国家划分为进攻性国家和防御性国家,这也构成了划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基石。笔者认为安全上的偏好不足以决定国家的类型。政治、经济和文化上“进攻”色彩浓厚,但是军事“防御”色彩浓厚的国家,与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防御”色彩浓厚,但是军事上“进攻”色彩浓厚的国家到底谁是进攻性国家,谁是防御性国家?仅凭战略偏好就界定国家类型太过片面。这种片面性导致该书无法解释(或放弃解释)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反复再现的根本原因。因为战略偏好必须依靠其他领域才能得到充分解释。

其二,对人类社会的类型划分太简单。如果综合考虑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诸多领域,就会发现唐世平的伊甸园、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更规则化世界的划分方法,不如前现代社会、现代社会和后现代社会等传统划分方式合理,后者的概念虽然显得太过宽泛,但是它们作为宏观框架更具包容性,围绕它们可以建立更细的研究议程,因此相较而言更具有生命力。

最后,在人类社会步入战争数量逐渐减少的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战争消亡的制度化世界后,我们应该用什么来判定人类社会的转型?唐世平对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与更制度化世界之间的分野并不明确,^② 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判定未来世界的走向?因此,“战争”这一关键概念缺乏整合全书内容的纵深与外延。在“战争”不起作用之后,另一个指标即“权力”浮现出来。“权力”在该书中多少有些超然存在的意思,唐世平认为它“起源于物质力量与精神力量的互动之中”,是社会选择的关键性力量。^③ 权力

① 就理论建构而言,微观理论和中层理论可以主要局限在某一领域。但是唐世平建立社会化理论的目标是要奠定整个社会科学的新范式,解释国际政治的系统变迁,因此过度依赖军事领域是很成问题的。

② 巴里·布赞在对这本书的评论中也提出了这一问题,即唐世平没有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与1945年之后浮现的规则化世界之间做出明确区分。参见 Barry Buzan, “Book Review,” p. 1305。

③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4.

概念的引入实现了两个目的：(1) 代替“战争”成为判断国际体系趋势的指标，但不是以肯定，而是否定的形式出现，即未来世界具体是什么样不得而知，但肯定不会出现世界政府，这也保证了未来世界一定范围的开放性；^① (2) “权力”所包含的非正义要素，使得这本书可以服务于唐世平所认可的由科学实在论倡导的社会科学的最终主题：人类解放。^② 但是“权力”概念的引入也给本书带来了麻烦。

第一，与“战争”相比，“权力”概念体现出更强的适用性。在绝大多数时候，战争只是权力的极端表现形式，是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虽然在不同的领域会有不同的表现内容和形式，但是权力贯穿于人类社会所有领域。迈克尔·曼 (Michael Mann) 认为，社会的结构和历史最好用四个社会权力来源，即经济、意识形态、政治和军事之间的相互交织来表述。人的天性难以满足，充满欲求，同时，人也是理性行为体，人们通过在行动中形成的组织和制度化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标。社会性互动形成了相互交叠的权力网络。因此理解组织化的权力成了理解人类历史发展的关键。^③ 虽然军事网络非常重要，但仅仅是权力的来源之一。

上述观点表明，相对于战争，以“权力”为主线的国际关系研究具有更大的合理性。唐世平虽然指出了以华尔兹为代表的结构现实主义的弊端，但忽略了以马基雅维利、摩根索等人为代表的经典现实主义的生命力。经典现实主义者意识到了“时间”给理论和实践带来的困难，也准确把握到了“权力”在人类社会生活中扮演的关键角色。但是他们对权力的处理方式在时间性和空间性上存在问题。以汉斯·摩根索 (Hans

① 唐世平在阐述能期待社会进化范式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时，明确指出社会进化范式是事后比较 (Post Hoc)。社会进化范式承认偶然性，所以它无法准确预测人类社会中特定进化进程的确切路径与结果。

② 徐立峰、唐世平：《科学实在主义与人类解放：巴斯卡的“批判实在主义”》（未刊稿）。

③ 参见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1—32。迈克尔·曼的学术思想体现在他的巨著《社会权力的来源》，该套书已写到第四卷，作为理论总结的最后一卷还未出版，但其基本思想在第一卷第一章已经进行了简单介绍。对曼的学术思想进行简介的中文文献可参见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第 135—156 页；李钧鹏《迈克尔·曼与批判社会学》，《人文杂志》2014 年第 8 期，第 100—107 页。

J. Morgenthau) 为例, 摩根索见证了由基督徒、世界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等构成的超国家伦理的崩溃, 所以他接受了尼采对现代社会“上帝已死”(Death of God) 的著名诊断。在这一背景下, 对“事实”(truth) 的追求构成了理解他总体思想的基石,^① 他试图通过求助于权力政治来克服现代社会“事实”的相对性造成的“诸神之争”。^② 但是摩根索将权力的根源追溯为人的动机, 而人类的根本动机在时间上很少发生变化, 在空间上几乎没有差异, 所以作为经典现实主义根基的动机驱动模型是反时间和反空间的, 经典现实主义者的理论最终只停留在了现在时。^③ 与曼相比, 经典现实主义者缺少个人动机与社会之间的中间机制。^④

第二, 权力与制度密不可分, 所以唐世平借用福柯、马克思和葛兰西等人对权力的批判否定了制度拥有绝对正义性的可能。他据此认为世界政府的企图非但难以实现, 更是充满危害的。^⑤ 他的批判立场值得肯定, 但对权力的分析导致了相对主义立场。

相对主义可以区分为认知相对主义(Cognitive Relativism) 和道德相对主义(Moral Relativism)。^⑥ 认知相对主义认为并不存在客观的真实世界, 有的只是不同的“视角”(perspective)、不同的人 and 群体基于文化、习惯等差异对世界有不同观察视角, 即具有不同的“世界”。^⑦ 道德相对主义认为道德准则的权威取决于时间和空间, 不存在普遍的道德评判标

① Sean Molly, “Truth, Power and Theory: Hans J. Morgenthau’s Formulation of Realism,” *Diplomacy and Statecraft*, Vol. 15, 2004, pp. 1 – 34; Mihaela Neacsu, *Hans J. Morgenthau’s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senchantment and Re-Enchantment* (Hampshire and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② 对现代社会的“诸神之争”理解和阐释可以参见张志扬等的《“古今之争”背后的“诸神之争”》文集,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③ Hans J. Morgenthau, *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Hans J. Morgenthau, *Scientific Man vs. Power Politics* (Chicago and Illinois: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46).

④ 曼对动机模型明确提出了批评, 参见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p. 5。

⑤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41 – 145.

⑥ 认知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之间的详细区分可参见 Steven Lukes, *Moral Relativism* (New York: Picador), pp. 2 – 28。

⑦ 对认知相对主义的详细介绍和批判可参见 Harvey Siegel, *Relativism Refuted: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Epistemological* (Dordrecht: D. Reidel Publishing Company, 1987)。

准, 批判的不同取向对两种相对主义有不同的立场。

批判性分析大致有三个维度的目标^①: 第一个是解构, 代表人物有尼采、福柯和拉康等。他们在认知和伦理上都持相对主义, 最终会滑向虚无主义, 因此后现代运动日益式微。第二个是“是什么”, 如巴斯卡的科学实在论。它强调实在, 拒绝认知相对主义,^② 但是经验描述是无法得出规范性陈述的, 这些规范性陈述(目的)“不会来自于自然本身, 它们来自于一个与自然不同的、超验的地方”,^③ 因此, 科学实在论有滑向道德相对主义的倾向。塞叶(Andrew Sayer)就明确指出, 在批判性社会科学(Critical Social Science)中, 包括巴斯卡的科学实在论在内都缺少规范维度, 造成解放过多, 责任太少。^④ 第三个是要在“应然”层面上探讨个人和社会的未来状态, 这种对“善”(good)的哲学思维强烈排斥道德相对主义, 却有滑向乌托邦或宗教式“弥赛亚主义”的风险。为了克服各自存在的危险, 三个维度需要相互平衡。

唐世平的社会进化论对“权力”的批判分析虽然有科学实在论的支撑, 但却没能完全避免认知相对主义。他认为所有制度、准则皆是来自地区个别的经验, 成为纯粹主观的东西, 社会事实的完全主观化与其在基本范式中主张的物质在本体论上的主导地位相悖。

在道德上, 唐世平更是明确主张应该奉行相对主义。^⑤ 这至少带来以下几个问题: 如果接受道德相对主义, 人们将缺乏接受基本道德准则的动机, 如禁止谋杀; 相对主义会剥夺我们的道德自信, 因为我们没有权力(right)去指责触犯道德准则的人; 相对主义通过不承认冲突真的存在而

① 这种划分是出于论述清晰之必要, 三个维度的目标在各个学者的理论体系中可能都会找到。但是三个维度在学者的论述中会占据不同的比重, 而且第一、二维度的理论家存在否认自己的理论含有第三维度的倾向, 尤其是第二维度的理论家。

② 拒绝和批判认知相对主义是科学实在论的一个主题, 参见 Ruth Groff, *Critical Realism, Post-positivism and the Possibility of Knowledge* (London: Routledge, 2004)。

③ 汉斯·波塞尔:《科学: 什么是科学》, 李文潮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第 230 页。

④ 塞叶指出社会科学中要实现“规范转向”, 参见 Andrew Sayer, *Realism and Social Science*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Ltd, 2000), pp. 155–188。

⑤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45。

取消了道德判断之间的冲突。^① 吊诡在这里出现了，从批判理论出发得到的相对主义最后是排斥批判的。

如果承认批判分析的第三个目标维度对人类而言是必要的，那么人类社会的演化就会出现方向和前景。^② 从这个角度看，康德、黑格尔、马克思和温特对于人类社会演进方向的思考就是可以理解的：虚无主义和相对主义必须依靠更高价值得以调校。因为取消了批判的第三维度，所以唐世平只能把道德规范交付给进化论，但问题在于进化论（包括社会进化论）自身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它无法给予个体和群体以存在的意义。在笔者看来，这是进化论一直没法在社会科学领域发挥巨大影响的重要原因之一。一种可能的辩解是社会进化范式的一种事后比较，所以不需要考虑“合目的性”或应然层面上的问题，但是正如唐世平在早先一篇文章中所指出的：“所有的国际政治理论都不是纯粹为了解析历史或者现在，而是为了指导现在的政策以塑造未来。”^③ 更重要的是，在开放时间的视野下，过去、现在和未来三者是相互影响的，个人和集体对未来的判断会影响对过去的重构和现在的思与行。^④ 社会进化论要想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站稳脚跟，必须重提（作为进化论兴起背景的）“古今之争”，妥善处理偶然性与合目的性、相对主义与绝对主义之间的张力。^⑤

① Steven Lukes, *Moral Relativism*, pp. 17–18. 对道德相对主义的批评还可参见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艾伦·布卢姆《美国精神的封闭》，占旭英、冯克利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② 这一观点并不否认方向和前景可能是错误的、是会发生变化和改变的。比如说“工业化浪潮”“民主化浪潮”等，它们都是人类社会具有一定方向性的体现。但是有如它们各自的批判者所言，这一趋势或方向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避免它们的负面影响又使人类社会出现另外的方向性。

③ 唐世平：《国际政治理论的时代性》，《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第141页。

④ 本文的第四部分对这一观点进行了更详细的阐述。

⑤ 唐世平在书中多次提到将用一本新书《论社会演化》（*On Social Evolution*）来详细阐述社会进化论，但是从其博客中已经列出的本书内容安排来看，他没有为解决这一问题留下篇幅。在笔者看来，社会进化论要想在社会科学发挥影响就必须合理处理这一问题。唐世平：《我的下一本书“*On Social Evolution*”（论社会演化）内容安排》，参见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a73490101pl7i.html。

三 空间与演化多样性

地理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巨大,“地理与人民二者常相待,然后文明以起,历史以成”。^① 唐世平已经注意到了地理环境对国际政治的重大影响,^② 但他的处理方式仍将空间范畴简单化了。他将地理环境附属于社会系统,即地理环境只是社会系统的一部分。由于人类社会系统在唐世平的理论体系中是以整体出现的,即在历史的阶段划分中整个人类社会系统在时间上是无差别的(在其划定的时间范围内,不同地域的部落、国家和文明呈现出统一的行为特征),所以不同空间的差异被消除了,地理环境的独立性消失了。^③ 对地理空间的这种处理方式彻底取消了次系统表现根本差异的可能性。

强调地理环境的独立性并不是奉行地理决定论,而是注意次系统表现出来的不同。多样性和复杂性是进化论的必然结果。地球上的所有生物彼此都有着或近或远的亲缘关系,有着共同的祖先。物种的形成过程就是生物多样性的增加过程。具体到人类社会,目前世界上大约有 1 万种不同宗教、7000 种不同语言,每种语言都含有 50 万左右的词汇。^④ 虽然人类具有类似的理性思维,这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可理解性和形式上的同一性,但是如果将人类基本的理性、行为能力看成是“基因”的话,那么它们之间的组合与互动则会产生截然不同的“表现型”:偏好、习俗和文化传统

①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文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8,第 5 页。

②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56 – 157.

③ 唐世平在另一篇与他人合著的文章中专门突出了地理环境这一因素的差异性,探讨了地理因素对美国战略思维的影响,“地理环境和被技术优势放大的综合国力是理解美国海外军事干预的两个不可或缺的物质变量”。参见唐世平、龙世瑞《美国军事干预主义:一个社会进化论的诠释》,《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 年第 9 期,第 84 页。但是,在《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这本书中,唐世平的内容安排和写作方式表明其否认了在长时段内次系统表现出巨大差异的可能性。

④ Alex Mesoudi, *Cultural Evolution: How Darwinian Theory Can Explain Human Culture and Synthesize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 ix.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说明的多样性无法证明前文谈到的道德相对主义的合理性,因为这是一种“外在观察”。如果将自己置身于文明“内部”,那就必须对如何处理不同文明间相互冲突的道德标准给出评判、协调与取舍,即依靠何种标准处理冲突,这些标准必然需要超越相对主义。

等。换言之，在地理、时间和人实践^①的驱动下，次系统还是可以表现出截然不同的行为方式和文化内涵的。

卡尔·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认为，在公元前 500 年左右和公元前 800—200 年的历史过程中，人类迎来了“轴心时代”。在“轴心时代”主要的文明体都创造出了不同的、将彼岸世界与此岸世界链接起来的系统的知识框架，直至今日依然是“我们思考的基本范畴，创造了人类赖以存活的世界宗教之源头”。^② 不同文明体不是黑格尔所说的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而是“同时代、并无联系地并列存在的一个整体”。^③ 正如奥斯瓦尔德·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和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所认为的，这些不同的文明都是有机的生命体，它们有自己的开始、发展和结束。^④

在农业时代，世界上存在着拉丁基督教世界（Latin Christendom）、伊斯兰和游牧文明（Islam and Pastoralism）、印度和种姓制度（India and Caste）及中华帝国（The Chinese Imperial State）。这几大文明都沿着自己的道路在发展，最后只有拉丁基督教世界演化出了现代工业文明。^⑤

① 这三者都具有特殊性，地理环境差异体现在地势、气候、土壤等等。受技术等可变因素的影响，地理之于个体和社会系统的意义处在变化之中。参见吴征宇《霸权的逻辑：地理政治与战后美国大战略》，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吴征宇：《地理政治学与大战略》，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时间对不同的人 and 地区也具有不同的意义，参见乔治·古尔维奇《社会时间的频谱》，朱红文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在教育背景、阶级背景、先天因素、偶然性因素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下，个人的实践会存在巨大差异（特殊性），群体也一样。但特殊性并不意味着不可理解，恰恰相反，有学者认为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的相互沟通与交流之中。参见陈嘉映主编《普遍性种种》，北京，华夏出版社，2011。

②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 7—8 页。

③ 卡尔·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第 18 页。

④ 参见奥斯瓦尔德·施宾格勒《西方的没落》，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1996；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郭小凌、王皖强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⑤ John A.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这里不是说拉丁基督教文明和现代工业文明是最好的文明，实际上它们都存在重大缺陷，比如说基督教思想传统中的“千禧年主义”流毒甚广，参见 James M. Rhodes, *The Hitler Movement* (California: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80)；约翰·格雷《黑弥撒：末世信仰与乌托邦的终结》，付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赵鼎新认为工业资本主义并不一定是一个值得庆祝的历史现象，他质疑其正反馈文化能持续多久。参见赵鼎新《费纳与政府史研究》，《社会学研究》2008 年第 4 期，第 210 页。

在不同的文明形态中,政治、经济和意识形态作为社会权力的来源运作方式是不同的。^①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例,宗教在中国和其他文明中扮演了完全不同的角色。实际上在从前轴心时代到轴心时代的过渡过程中,中华文明就表现出与其他文明不一样的地方,即孔子(轴心时代)更多的是继承和发挥了周文化(前轴心时代),而不像其他文明与前轴心时代更多的是对立。周文化经过轴心时代儒家文化的发展定型为中国文化以后几千年的气质,“这种气质与那些重视来生和神界,视人世与人生为纯粹幻觉,追求超自然的满足的取向有很大不同,更倾向于‘积极的、社会性的’、‘热忱而人道的’价值取向”。^②因此,宗教一直未能在中国占据核心地位,中华文化具有很强的入世和理性主义倾向。反观欧洲,直到 17 世纪左右才逐渐摆脱政教合一的状态,这也是中国文化在 18 世纪受到启蒙思想家推崇的根本原因。

文明的差异性拓展了文明进步的空间。著名法国汉学家朱利安(Francois Jullien)从解析《易经》的开篇乾卦“元亨利贞”入手,认为中华文化在其开端就不同于希伯来、希腊文化。希腊思想以二元对立(真理/表象、主体/客体、存在/生成等)为开端,《易经》首句思考的却是所有过程(天之道)的启动、开展、得利和更新。《圣经》以创世者作为第一主体,而“元亨利贞”抛开了主体,思考的是过程之中的操作性。因此,中华文化对欧洲文化来说构成了完全意义上的“他者”(由于地缘关系,欧洲对印度文化和阿拉伯文化是相对熟悉的),这个“他者”是欧洲思想在以后能够得以继续拓展的宝贵资源。但是到目前为止,欧洲仍然只是以先进文明自居来欣赏和把玩作为“异国情调”的中国文化,从来

① 与曼不同,霍尔(John A. Hall)认为军事不能作为单独的一个社会权力的来源,它只能附属于政治。例如火药作为一个重要的军事技术只有在欧洲这样的国家体系中才能占据主导地位,而在不同的国家结构中,如中国完全可以脱离它而正常运转。参见 John A. Hall, *Powers and Liberties: The Causes and Consequences of the Rise of the West*, p. 19。

② 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的思想根源》,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第 7 页。

没有真正“进入”这个他者。^①

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同空间的次体系也可能具有完全不同的特征。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东亚次系统并不符合唐世平的进攻性世界的划定。他主要以兵家（孙子）和法家（韩非子）的著述以及秦国的历史事实为依据来论证中华体系的进攻性现实主义特征。但是应该注意到，韩非子和秦文化是对周文化的反叛，秦国皈依法家后迅速崛起也迅速败亡，法家此后也一蹶不振，自此从未成为华夏文化的主导。这也说明进攻性现实主义有强烈的自噬逻辑，根本不可能持久。继秦而起的汉朝建立在对法家和秦朝历史深刻的反思之上，从陆贾到贾谊，再从晁错到董仲舒，汉儒批法批秦一以贯之，所以有学者认为“‘灭秦’或‘秦灭’也绝不止于一朝一姓之灭亡，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思想方式、感受（或感情）方式的覆灭”，是合理的。^②

从汉朝反对秦的重法开始，中国的战略传统发生了根本转变。虽然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除了存在“以精致迂回、规避激战、不冒风险和严控成本为首要特征的孙子式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之外，中华帝国也确实存在“决战决胜的彻底歼灭和大规模远征的战略传统”，^③但是学者们大多同意最晚从宋代开始，中国就具有了内敛的性质，用唐世平的术语来说是奉行“防御性现实主义”。著名史学家雷海宗先生甚至认为，自秦以下中国都是“一个完全消极的文化，主要特征就是没有真正的兵，也就

① 朱利安：《进入思想之门：思维的多样性》，卓立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② 张祥龙：《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41页；陆贾的传记参见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第2111—2116页；贾谊的传记参见班固《汉书》，第2221—2266页；晁错传记参见班固《汉书》，第2276—2305页；董仲舒传记参见班固《汉书》，第2495—2528页。这些传记对他们的生平和主张进行了简要的介绍。汉儒评秦首推贾谊的政论代表作《过秦论》，其全文可见刘殿爵编《贾谊新书逐字索引》，香港商务印书馆，1994，第1—6页。

③ 时殷弘：《武装的中国：千年战略传统及其外交意蕴》，《世界经济与政治》2011年第6期，第4—33页。时殷弘教授指出到明朝，儒家战略在中国占据上风，中国的战略传统没落。朱中博认为要注意中国大战略行为中的双面性，但他同时指出“中国在强大时期（包括国力上升时期）的战略仍然是以消极性为主”。参见朱中博《中国古代强盛时期的大战略》，《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4期，第32页。

是说没有国民，也就是说没有政治生活。为简单起见，我们可以称它为‘无兵的文化’”。^①

虽然朝代循环往复，“夷夏”互有攻守，但是在中华帝国主导下的地区国际体系几乎从来都不是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唐世平所罗列的国家数量的减少，与其说是战争逻辑的结果，不如说是文明扩展的结果：中华文明的主动传播以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不断被同化。^② 因此，笔者赞成赵鼎新对中国历史两项主要特征的判定：^③ 第一，与古代世界其他地方不同，在中国帝制时代，军队由文官控制，军队将领不拥有决定性的影响，除非内战和乱世，武将一般没有干预政事的能力；第二，世界史上绝大多数帝国均凭借军事征服以实现领土扩张，而帝制中国的开疆拓土，特别是其在北方的影响，常常是北方游牧民族入主中土之后自身汉化的结果。^④

通过上面的论述，为了更好地分析空间在人类社会演进中扮演的角色，笔者主张将“地理”从“系统”的定义中分离出来，但是在研究系统时要考虑系统与地理环境之间的互动。这样一来开放的历史不仅可以在时间维度展现多样性，也可以在空间维度涌现出复杂性。

①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长沙，岳麓书社，2010，第102页。

② 雷海宗：《中国文化与中国的兵》，岳麓书社，2010，第125页。这也质疑了唐世平的一个判断，他认为那些拥有良好制度（能提高整体福利）的群体或国家会赢得战争的胜利。但在历史上往往是“蛮族”战胜先进文明，导致先进文明的灭绝，或者蛮族被“文明化”。这同样证明军事领域不同于政治、文化领域的独立性和特殊性。

③ 赵鼎新：《东周战争与儒家国家的诞生》，夏江旗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1—2页。

④ 有学者质疑中华文明的拓展与近代西方的“文明帝国主义”类似（参见时殷弘《文明帝国主义的中国版本：司马相如〈难蜀父老〉及其他》，《文化纵横》2011年第4期，第97—100页）。笔者认为即便多少有些相似成分，但是中华文化辐射圈的扩大决然不同于近代西方的“福音式”外交。虽然中国自古以来也有“夷夏之辩”，如孔子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原文及其解释可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第81—82页）。但是“夷夏”之间没有绝对对立，更重要的是传统中国不推崇以暴力形式推广自己的文化价值观，而强调通过自我反思来树立榜样，“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参见李泽厚《论语今读》，第451页）“福音式”外交根植于希腊—基督教的二元对立传统，在实践上则表现为认可和鼓励武力改造“落后文明”（包括殖民、奴隶和种族屠杀）。关于中国的“夷夏之辩”参见曾亦、唐文明主编《中国之为中国：正统与异端之辩》，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四 历史哲学与演化随机性

唐世平是反对线性历史观的，但是他对时间的处理却表现出“线性”特征。他的“线性”色彩体现在将人类历史划分为几个截然不同的阶段，而且这些阶段不可逆转。正因如此，唐世平认为错过一个时代，理论的适用性就无法挽回地逝去了。

唐世平在这本书中对人类阶段的划分归根结底是以精神为标准的（虽然这些精神有物质支撑），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更加规则化的世界终究要落实到个体和集体的精神层面。^①但是与物质不同（学者们对人类阶段的划分恰恰多是以物质性的标准为根据的）^②，人类的精神却不是不可逆转的。如果说进攻性现实主义文化在防御性现实主义和规则化的世界被移除了，那么从根本上讲，处于后两个世界的人是无法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的。进攻性现实主义文化依然可以被理解，这一事实说明，个人和集体依然可以运用进攻性文化蕴含的思维方式。只要这种思维方式还能被人类运用，就无法保证它不会再被付诸实践。正如社会进化论所强调的偶然性，系统在未来的“突现效应”可能会激发这一思维方式。例如，前文提到秦文化在秦朝立国 15 年后在中华文化中就难以立足，但是到了毛泽东时代，秦的文化特征、思维方式和政治精神又一次得到比较清晰的浮现。^③

① 唐世平不否认在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中会出现进攻性现实主义国家（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97），这就承认战略偏好可以脱离世界政治的现实状态（唐世平意义上的）而出现，说明如果没有彻底改变精神层面（要彻底改变战略偏好），世界的转变只是空谈。

② 如以政治组织为标准，人类社会可以划分为群体（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s）。按照制造工具的物质和技艺，人类划分为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按照生产方式，人类社会被划分为狩猎及采集、农业和工业时代等等。参见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28。

③ 从毛泽东时代对秦朝的推崇可见一斑，而且秦的自噬逻辑在这一时期也再次得到清晰体现。参见张祥龙《拒秦兴汉和应对佛教的儒家哲学：从董仲舒到陆象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第 38—39 页。

个体和集体的精神可以逆转源于两个原因：第一，来自个人心理学的解释。虽然在不同的时代其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但是基因决定了人类的一些行为或观点会反复出现。^① 唐世平对生物社会学和进化心理学的最有力攻击是个人基因与群体行为之间缺乏必然的逻辑联系，但是考虑到个体在本体论上占据更大比重、群体容易进入集体无意识、集体可以学习个体行为等等原因，个人心理学还是可以解释很多集体行为的。

第二，个人和集体拥有学习和反思能力。^② 个人和集体会学习过去的技术、经验和文化。此外，个人和集体还拥有反思能力。一旦在未来遇到非预期的事件，个人和集体会对过去进行反思和重构。反思和重构针对的是社会时间而非物理时间。后者是真实发生的事情，一旦过去就无法更改，而前者在现在和未来则会被个人和集体不断重组并赋予不同意义。反思和重构的社会时间层面不断发生，被抛弃的习俗、文化、思维方式在未来必要的情况下会被重新赋予意义。因此可以说，个人和集体在现在和未来会有意识地恢复过去的社会结构和社会文化。^③ 因此，任何人都无法宣称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或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已经不可逆转地逝去。虽然个人的理性现在无法理解进攻性现实主义和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再返，但是如果理性能完整地推定未来，社会进化论所强调的偶然性就是无意义的。

如果线性的时间观并不正确，那么应该持有何种时间观（历史哲学）呢？贝尔特（Patrick Baert）总结了西方的思想传统中的三种时间观：永

①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48–49.

② 唐世平认为“严格说来，集体并不学习，只是其中的个体学习。集体学习终究要依赖于个体学习”。（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 169）笔者认为集体也拥有学习能力，这种能力蕴藏于集体的交流互动与模仿能力之中，因此集体可以通过学习获得“共有知识”“共同身份”等等。而且个体的一些学习能力（如沟通、换位思考等）离开集体是难以实现的。

③ 比如说近年来很多人对民国进行了反思和重构，这有助于我们重新认识那段历史。但是不少学者对于民国时期学术发展、自由风气、政治生态及精神风貌的描写过于片面和夸大，使民国俨然成为一个失落的“乌托邦”，含有严重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这是物理时间和社会时间脱节的明显案例。对个体和集体的反思能力的探讨，参见帕特里克·贝尔特《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陈生梅、摆玉萍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第94—135、139—140页。

久排列的时间观 (Eternal Permutational Conception of Time)、封闭的历史观 (the Closed Historical Conception) 和开放的时间观。^①

永久排列的时间观认为存在永恒的完美秩序,在流动的时间中出现的规则只是完美秩序不完全乃至扭曲的显现。巴门尼德、柏拉图和笛卡尔是这一时间观的代表人物。20 世纪大行其道的结构主义也认同这种时间观,主张无时间的结构存在于人类社会始终。以这种时间观为指导的理论认为只要进行共时性研究就足够了,因为世界的本质永恒地存在于现在。

封闭的历史观认为永恒秩序将随着时间的展开而最终显现。基督教的阶段论是封闭历史观的典型代表。受物理学机械因果论的鼓舞,封闭的历史观在 19 世纪占据主流,孔多塞和赫尔德等历史学家是代表人物。但是随着封闭的时间观在实践上的失败以及在理论上不断受到责难,^② 其在 20 世纪末走向没落。

上述这两种时间观在西方历史上占据主导地位,所以西方社会科学都注重共时性研究,寻求建立普遍联系。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功能主义和结构主义能够长期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对这两种时间观的执着忽视了第三种时间观,即开放的时间观的存在。

开放的时间观认为秩序只存在于时间之中,每个“现在”都可能把

① 对这三种时间观的划分与总结参见帕特里克·贝尔特《时间、自我与社会存在》,第 1—9 页。

② 最著名、影响力最大的批判来自卡尔·波普尔 (Karl Popper)。参见卡尔·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杜汝楫、邱仁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质疑、对开放社会的倡导获得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既源自于波普尔思想其本身的深度与力度,同时也得力其契合了战后西方主流思想以及“政治正确”的时代话语。也有学者对其思想表示了怀疑乃至激烈批判,如列奥·施特劳斯 (Leo Strauss)。参见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第 7 页。波普尔的问题在于他否定了历史决定论之后,为我们呈现的是断裂的、破碎的、残片式的人、世界和历史,由此潜藏了两个最重要的危机,即主体虚无与彼岸破除。陈思贤的一段追问很有启发意义:在社会哲学中“good”有两层意义,一是“裨益”,一是“善”;我们可将“点滴工程”(即渐进的社会工程)理论视为替我们追寻实际生活上的“裨益”,而政治“哲学思维”则是追求“善”的蓝图,但我们怎可忘记那古典哲学中的首要信念:“善”是人类生活中最大的“裨益”?参见陈思贤《西洋政治思想史(古典世界篇)》,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8,第 238 页。

“过去”和“未来”分开。这种时间观的典型代表就是达尔文。但是开放的时间观就意味着历史是完全随机的吗？约翰·杜威（John Dewey）认为，人的存在必须依赖一定程度的确定性，追求确定性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改变自我来适应环境，这表现在传统哲学对思辨和理论的崇拜以及宗教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上；另一种是通过技术实践来改变环境。^①

偶然性/随机性和确定性的共同作用，意味着历史哲学要摆脱变化与不变之间的二元对立。以赫拉克利特和巴门尼德/柏拉图为代表，西方的历史观念总徘徊在绝对变化与恒久性两极。一个可以操作的路径是引入短时段和长时段的区分。在系统中人的行为与互动多集中在短时段而结构和趋势却体现在长时段。短时段不断面临着偶然性和（行为和互动的）非意图结果，长时段的结构和趋势却具有相对稳定性。

但是与结构主义不同，本文认为长时段里也会发生突变。突变的原因在于个人和集体会反思在短时段里遭遇到的偶然性和非意图结果，然后会对社会结构和趋势进行修正。但是这里反思和修正是有限度的，历史并不会因此而呈现出随机的性质：

其一，因为社会结构对人的行为有强大的规范功能，因此在遇到偶然性和非意图结果时，个人首先想到的不是调整社会结构和趋势，而是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结构和趋势。

其二，结构和趋势的变更依赖于集体的反思和行动。个人和小集体在偶然性和非预期结果的冲击下，即使认识到了既有结构和趋势的不合理，也缺乏足够力量对它们进行修正。个人和小集体缺乏足够的组织力量来整合权力资源以对抗现有秩序，所以往往只能以零散的反社会行为而告终。

其三，如果集体进行反思后决定改变现有结构和趋势，变革行为的发

^① 约翰·杜威：《确定性的寻求：关于知行关系的研究》，傅统先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

生也无法脱离传统。不存在“无中生有”，对结构的改变必须依赖于历史资源。因此，历史的变化与不变的辩证统一，存在于短时段和长时段的交互作用中。^①

变化与不变的统一意味着唐世平持有的不可逆转的历史观是不可取的。物理时间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声称社会实施了新的制度以及建立了新的文化之后就不会再回到以前的制度和文化之中却是错误的。人们总是在有意识地复制和重演过去的制度和规范。

本文认为循环论和辩证法更符合上面分析的历史观。循环不是无变化，而是类似于维柯、斯宾格勒和汤因比等人主张的逻辑模式的重复，借用柯林伍德对维柯的理解来解释这里的循环：“这种周期性运动并不是历史通过若干固定阶段周而复始的一种单纯的循环，它不是一个圆而是一个螺旋；因为历史绝不重演它自身，而是以一种有别于过去事情的形式而出现在每个新阶段。”^② 历史的变化从稳定、渐变到突变再回到稳定、渐变也呈现出逻辑循环。辩证法的正题、反题与合题意味着每个阶段都会引起相反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存在着矛盾，矛盾引发稳定中的渐变，最后迎来突变，突变之后又会存在新的矛盾。^③

真实的历史比唐世平设想的要更为复杂。不同的个人和组织（次国家行为体、国家和跨国行为体等等）在循环和辩证过程中拥有不同的节奏和方向，它们之间的互动在趋同的同时也会产生新的分离。所以不存在伊甸园、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和规则化世界的划分，在空间范畴里它们往往并存，在时间范畴里它们可能隐匿不现，也可能重新降临。

① 因此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只能被“中国化”。即使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最彻底、最极端的与传统告别的运动中，其内在实质也最多只能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② 柯林伍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69页。

③ 但是应该放弃黑格尔和马克思辩证法中的封闭的时间观。在他们认为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的反思和行动能力显得微不足道，更高级的历史在未来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出现，这与开放的历史哲学相违背。

五 社会进化论与国际关系理论创新

社会进化论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对国际关系理论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启示。从本体论上讲,首先,社会进化论强调系统研究,进化只能发展在系统里。因此,唐世平号召要“打倒结构的正统地位”。^①受肯尼思·华尔兹新现实主义革命的影响,^②结构主义在国际关系领域确立了统治地位。自此之后,现实主义(进攻性现实主义、防御性现实主义和新古典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均未能突破结构主义的影响。尽管他们对结构的定义有所不同,许多学者也对华尔兹的结构理论进行了反思,^③但唐世平正确地指出,只要视野仍然局限在结构上,那么对国际政治的理论认知将依然是不全面和扭曲的。国际政治是系统,而非结构,^④“结构自身能决定的东西微乎其微”。^⑤只有系统研究才能综合九个基石性,协调处理物质与观念、个人与群体、行为的驱动力以及和谐与冲突等

① 这里借用了唐世平在另一篇文章中的表述,参见唐世平《一个新的国际关系归因理论:不确定性的维度及其认知挑战》,《国际安全研究》2014年第2期,第38页。

② 阿什利对结构主义和华尔兹的结构理论进行过深入批判,但是与阿什利的“破而不立”相比,唐世平不仅对结构理论进行了批判,而有效地建立起了系统理论。参见理查德·K.阿什利《新现实主义的贫困》,罗伯特·基欧汉编《新现实主义及其批判》,郭树勇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第232—273页。结构主义在国际政治研究中大行其道,还受科学主义思潮的影响,后者致力于建立单一的、普世的且简洁优美的理论。

③ 不同理论流派对“结构”的定义是不同的。华尔兹和米尔斯海默的结构定义是完全物质性的,而且只考虑物质力量分配(因为无政府状态是恒常的,国家的性质一样)。罗伯特·杰维斯、格拉泽等人则在物质维度中加入了技术等要素。温特则将个体和互动纳入了结构定义,但是与现实主义者不同,他的结构定义完全倒向了精神力量。与华尔兹和温特相比,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定义则考虑了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如相互依赖就既是物质也是精神的)。唐世平将结构界定为“一套制度系统”,这与华尔兹物质化的结构定义截然不同。在社会学研究中“结构”更倾向于唐世平的定义,即将“结构”视为一套规则、制度甚至意义系统。参见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53—156。

④ 唐世平对系统的定义、系统与单元的互动等等参见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51—178。

⑤ Shipping Tang, *The Social Evolution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pp. 161—166。

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四大纬度，充分融入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①

其次，社会进化范式要求将时间维度赋予系统研究。^② 现在的社会科学研究普遍存在“去时间化”的倾向，郝诗楠和唐世平曾对这一倾向进行了批评：“长久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好像忘记了时间。”^③ 国际关系研究对普适性的追求几乎到了偏执的地步，结构和系统研究都是去时间化的。即使是赋予“无政府状态”以可变性的温特也承认“建构性分析在本质上静态的”。^④ 唐世平的研究将时间纬度带入了国际政治。他提倡的社会进化范式认为社会系统是一个随着时间而进化的系统，其进化的力量来源于九种基础范式所阐释的力量之间的互动。

在认识论上，为了研究不断变化的世界，本文认为应该加强科学实在论基础上的（因果）机制研究。所谓“机制”是指事物起作用的方式，它要么存在于事物自身的结构，要么存在于事物之间的结构。机制并不是能够体验到的客体或事件，它是一种倾向。^⑤ 事物的发生必然由某种或某些机制引起，但是某种或某些机制的触发并不一定导致事物的发生，因为除了少数系统外，绝大部分自然和社会系统都是开放系统，里面存在着无数机制，这些机制有可能相互促成，也有可能相互抵消。

科学实在论者认为因果机制的研究要优于实证主义的因果关系研究，“休谟对于因果关系的考察只停留在事物的认知层面，缺乏一种存在论层

①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甚至认为连“系统”研究都是故步自封，因为这一概念认为人类社会存在一个有边界的终极形式，这严重低估了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参见 Michael Mann, *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 pp. 1-32。

② 罗伯特·杰维斯的系统研究虽然存在“反馈机制”为系统变迁提供了一定动力，但毕竟没有明确提出要将时间维度纳入系统研究，更没有细致研究系统变迁的具体机制。

③ 郝诗楠、唐世平：《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时间：时序与时机》，《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4年第2期，第194页。

④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80页。

⑤ 任晓明、赵华：《批判实在论的因果机制思想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9期，第42页。

面的整合,本身是无根基的”。^① 唐世平将进化论的核心机制“变异—选择—遗传”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并发展出自成体系的社会进化论,用社会进化机制来整合国际政治领域的既有理论,在确保简洁优美的同时整合了大量的事实证据与理论思想,显示出机制研究的优势与发展潜力。

正是有了在上述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突破,唐世平的《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论》成了亚历山大·温特 (Alexander Wendt) 之后少有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之一。在国际关系理论创造乏力的大背景下^②,该理论创新带给国际关系学者不少启发。第一,要注重本体论研究。唐世平对科学实在论的研究赋予了其理论创新以本体论深度,这与以往国际关系领域重要的理论突破是一脉相承的。无论是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还是建构主义,都是在本体论上取得了进展。

在国际关系学界,很长一段时间内对方法论的争论取代了对本体论的探讨,有学者表示:“我过去、现在仍然为学科主流理论中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自觉的缺失及其带来的后果感到震惊,在理论中方法论和意识形态占据了主导地位。”^③ 方法论的提高对学术发展来说固然重要,但如果没有本体论的支持,学术研究将落入机械的模型演练和格式推导之中。方法论之争产生了方法论唯一主义和至上主义,导致争论者各执一端。其实,社会系统的复杂多样决定了方法的多元。保罗·费耶阿本德 (Paul

① 任晓明、赵华:《批判实在论的因果机制思想探析》,《自然辩证法研究》2009年第9期,第42页。也有学者对科学实在论的机制研究进行了批判。参见Walters and Young, “Critical Realism as a Basis for Economic Methodology: a Critique,” *Review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3, No. 4, 2001, pp. 483–501。社会学对机制研究探讨的比较多,参见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 *Acta Sociologica*, Vol. 39, No. 3, 1996, pp. 281–308; Peter Hedström and Richard Swedberg, *Social Mechanisms: an Analytical Approach to Social The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Neil Gross, “A Pragmatist Theory of Social Mechanism,”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No. 3, 2009, pp. 358–379; Charles Tilly, “Mechanisms in Political Processe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4, 2001, pp. 21–41。寻找机制的方法可参见唐世平《如何发现机制》,该文载于其新浪博客,参见网址: http://blog.sina.com.cn/s/blog_744a734901015x1r.html。

② 在与笔者的一次谈话中,罗伯特·杰维斯表示他和米尔斯海默等人认为现在已经到了重新把国际关系理论找回来的时候。

③ Hartmut Behr, *A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Ontological of the International*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p. ix.

Feyerabend) 认为,并不是所有的科学发现都会遵循相同的方式。某个科学理论试图为所有科学活动设立统一的标准和结构,并求助于“理性”或“合理性”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这无疑是故步自封。量化在这里成功了,但在分析另一问题时却有可能失败。因此费耶阿本德倡导方法论多元主义。^①

科学哲学和思想史可以为本体论创新提供思路。科学哲学直接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相关,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对库恩(Thomas Samuel Kuhn)和拉卡托斯(Imre Lakatos)等学者比较熟悉,但是对整个科学哲学史及其新近的发展比较陌生。^②唐世平通过借鉴科学实在论对本体论的讨论实现了创新,将视角转向了发现国际政治变迁的核心机制。思想史的重要意义从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 N. Waltz)的理论创造中可见一斑。华尔兹认为理论创新既不是源于归纳,也不是来自演绎,而是来自于一闪念的创造,^③这个一闪念就来自于思想的积累,如果没有在《人、国家与战争》中对卢梭等思想家的“结构”思想的挖掘,华尔兹也不会写就《国际政治理论》。

第二,国际关系理论突破还必须依靠跨专业研究。国际关系学一直在强调自己的独立性,用以凸显和增强自身的学科地位。这对推动国际关系的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国际关系学科在面临着创新乏力的情况下,应该反思自身独立的限度。在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国际关系学与哲学、历史学、社会学、心理学、环境学、经济学和语言学等联系紧密。在政治学主学科内,国际关系作为分支学科与政治理论、比较政治、公共政策更是密不可分。

有学者甚至提出需要以国际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代替国际关系(International Relations)。^④以战争研究为例,战争研究一直是多学科、

① Paul Feyerabend, “Introduction to the Chinese Edition,” in *Against Method*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0).

② 舒炜光编《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③ 肯尼思·华尔兹:《国际政治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第10页。

④ Pami Aalto, Vilho Harle and Sami Moisio,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disciplinary Approaches*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跨学科的研究内容,只有到了建立国际关系专业的“学科转向”时才成为国际关系学者的专业研究内容。专业化是必要的,也是有益的,它促进了知识的增加和研究的精细化。但是专业化是以狭隘的学科视野为代价的,研究战争的学生往往成为自己学科的囚徒,他们只了解战争某一方面的特征,却忽略了更广阔的图景。国际关系研究者对战争的研究集中在战争的原因、国际权力分配、领袖的(错误)知觉、国内政治体制和经济联系等相关问题上。^① 这些问题虽然很重要,但是学者们却忽略了其他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战争的内在动能、战争对于参与者的意义等等。唐世平的理论创新根植于他对生物学领域知识的深刻把握,没有对进化论的创造发挥,《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社会进化论还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首先,唐世平提出的是系统理论,因此对微观层次关注较少。学者可以进一步深化社会进化论在不同分析层次和具体领域的运用,虽然已有学者在这方面进行了努力,但仍然有很大的理论生长空间。在研究具体问题时,还需要挖掘进化论的补充机制。达尔文自己也承自然选择理论对具体现象无法提供充分解释。比如说,有的鸟羽毛是彩色的,而有的则是灰色的。鲜艳的羽毛可以用性选择(吸引异性)这一特殊机制解释,而伪装和躲避天敌则可以解释暗淡的羽毛。但是这两个机制之间是相互排斥的,都不具有普遍性。因此,进化论的“变异—选择—遗传”机制并不是像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理论那样论证充足,它是类似于拱顶石的理论框架,特殊的假定和辅助理论对进化论而言是必要的。^②

其次,“达尔文主义综合”(Evolutionary Synthesis)。进化论提出后,生物学领域出现了很多分支,如实验主义、理论建模、野外博物学、古生物学等。每一个分支都有自己理论话语体系且往往相互冲突。20 世纪三

^① Jack S. Levy, “War and Peace,” in W. Carlsnaes, T. Risse and B. A. Simmons eds, *Handbook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ondon: Sage, 2002).

^② Geoffrey M. Hodgeon and Thorbjorn Knudsen, *Darwin's Conjecture: The Search for General Principle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Evolution*, pp. 4–5.

四十年代，生物学家对这些分支进行了整合。在综合过程中进化生物学成为真正统一和产生巨大影响的学科。社会进化论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也可以进行“达尔文主义综合”，建立新的学科。^①

目前在国际关系领域已经出现了一些利用进化论研究具体问题的成果，如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对“合作”的研究、^②莫瑟（Jonathan Mercer）对“身份与战争”的研究^③、洛佩兹（Anthony C. Lopez）等学者对“认知与决策”的考察^④、国际体系等起源发展等等，这为进一步深化研究和进化论综合提供了一定的基础。除了学科内部综合外，国际关系中的进化论还可以纳入其他学科的进化论研究成果。

20世纪70年代，爱德华·威尔逊（Edward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和《论人类本质》两部书的出版，标志着社会生物学的兴起。威尔逊试图用生物学术语来解释所有的社会现象。^⑤在经济学领域，进化论的运用比较广泛，出现了演化经济学（Evolutionary Economics）、演化博弈论（Evolutionary Game Theory）分支。^⑥大卫·巴

① Alex Mesoudi, *Cultural Evolution: How Darwinian Theory Can Explain Human Culture and Synthesize the Social Sciences* (Chicago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1), pp. 205–220.

② 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合作的进化》，吴坚忠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Robert Axelrod and Robert O. Keohane, “Achieving Cooperation Under Anarchy: Strategies and Institutions,” *World Politics*, Vol. 38, No. 1, 1985, pp. 226–254.

③ Jonathan Mercer, “Anarchy and Identit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 49, No. 2, 1995, pp. 229–252.

④ Anthony C. Lopez, Rose McDermott and Michael Bang Peterson, “States in Mind: Evolution, Coalitional Psychology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6, No. 2, 2011, pp. 48–83; Mark Van Vugt, “Cognitive and Social Adaptations for Leadership and Followership: Evolutionary Game Theory and Group Dynamics,” in Joseph P. Forgas, et al., *Evolution and the Social Mind: Evolution Psychology and Social Cognition* (East Sussex: Psychology Press, 2007).

⑤ Edward Wilson, *Sociobiology: The New Synthesi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Edward Wilson, *On Human Natu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⑥ Richard R. Nelson and Sidney G. Winter, *An Evolutionary Theory of Economic Chang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2); Richard R. Nelson, “Evolutionary Theorising in Economics,” in Michael Wheeler et al., *The Evolution of Culture Entit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John Laurent ed., *Darwinism and Evolutionary Economics*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01); 库尔特·多普菲编《演化经济学：纲领与范围》，贾根良等译，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乔根·W. 威布尔：《演化博弈论》，王永钦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斯 (David Buss) 的《进化心理学》是进化论在心理学中运用的代表作, 他用进化论来解释择偶策略、亲属关系、合作联盟和两性冲突等一些心理学中的核心问题。^① 在文化研究中, 进化论在微观和宏观领域都有运用, 前者关注个人的文化特征,^② 后者注重群体或社会的文化变迁和延续。^③ 在政治学的思想论辩中, 进化论也卷入其中。激进主义用达尔文来反对传统。保守主义则在人性、合作等关键议题上认同进化论思想, 因此诞生了达尔文保守主义。^④ 古典自由主义学者则指出达尔文主义根本无法维持客观的道德标准, 更危险的是在达尔文的理论范畴里个体缺乏独一无二的深层次意义和价值, 所以具有颠覆人的自然权利的危险倾向。^⑤

在《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一书中, 唐世平对社会科学里既有的进化论研究成果关注较少, 这使他忽略许多已有的洞见, 例如, 达尔文保守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之间的争论可以为他克服相对主义提供一些启示。

六 结论

《国际政治的社会进化》一书气势宏大, 具有为国际政治学科 (乃至整个社会科学) 奠立新的系统范式的雄心。本文从分析唐世平对科学实在论和社会科学基础范式的研究入手, 突出该书的本体论、认识论基础以及理论建构的完整逻辑。在本体论上, 唐世平倡导通过系统研究来克服结

① D. M. 巴斯:《进化心理学》, 熊哲宏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② Luigi Luca Cavalli-Sforza and Marcus W. Feldman, *Cultural Transmission and Evolu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Robert Boyd and Peter J. Richerson, *Culture and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5).

③ Michael J. O'Brien and R. Lee Lyman, *Cladistics and Archaeology* (Salt Lake City: University of Utah Press, 2003); Peter Turchin, *Historical Dynamics: Why States Rise and Fall*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④ Kenneth C. Blanchard, *Darwinian Conservatism: A Disputed Question*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05); Francis Fukuyama, *America at the Crossroad: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7).

⑤ Stephen Dille, ed., *Darwinian Evolution and Classical Liberalism: Theories in Tension* (Plymouth: Lexington Books, 2013).

构论的简单化倾向。同时他将时间维度赋予系统研究，将开放的时间观引入国际政治研究。在认识论上，科学实在论认为世界究其本质是由机制构成的，因此可以以机制为切入点来分析不断变化的人类社会系统。唐世平认为能够应对系统之复杂和变化的最根本的机制是进化论的变异、选择和遗传。围绕这一机制，在协调处理物质维度和精神维度的基础上，搭建了社会进化论，在他看来，这一范式有效地综合了社会科学研究中的九个基础性范式和系统范式。

唐世平将战争确定为划分进攻性现实主义世界和防御性现实主义世界的根本指标。他严重高估了战争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而忽略了经济、文化和政治等其他维度。本文认为权力概念比战争概念更能凸显人类社会的核心动能。唐世平的分析还导致了认知相对主义和道德相对主义，这是社会进化论应该解决的问题。在处理空间问题时，他忽略了次系统的多样性，而这是进化的必然结果。在时间观上，唐世平的开放时间观只体现在未来时，这导致他持有不可逆转的历史观。本文认为必须打破时间观的二元对立，过去、现在和未来是能够相互影响的。

学者可以从两方面促进社会进化论在国际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用进化论研究具体的问题领域，并发现进化论的补充机制；另一方面在合适的时机进行“达尔文主义综合”，在学科内设计统一研究框架，整合进化论的具体研究成果。同时还可以借鉴和整合进化社会学、演化经济学、演化博弈论、进化心理学以及达尔文保守主义等较成熟的研究成果。